《长江》的第一章与《华北》的第一章类似，都做形式主义、实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演变的理论综述。不过在组织方式上，《长江》第一章的这种以理论为纲要的编排也许更使人能够把握理论脉络。对照起来看最佳。关键的一句是：“在长江三角洲，本书将会说明，道理基本相似，小农家庭在土地压力面前，为低报酬而更充分地使用家庭辅助劳动力。”

《长江》提出的某些总结性的结论也许能够帮助更好地理解《华北》。例如“通过人口增长理解商品化；也通过商品化理解人口增长”的结论，虽然在《华北》当中有毫无疑问的体现（包括人口增长通过作用于贫农家庭的作物组合选择促进商品化的路径，和商品化促进农村年轻人早日自立提高出生率的路径），但这里提出对我产生的冲击也还挺大的。以及，将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前景概括为“远不是小农生产让位于大规模生产，而是通过其承受劳动力投入报酬低于市场的能力阻碍了雇佣劳动生产的发展”的描述同样如此。但对集体化运动和“反过密化”现象对经济的影响，是在《长江》中首次集中提到的。这也是作者在第二编中要研究的内容。

第二章仍为自然环境概述。排水条件对于棉花、水稻、桑树的种植比例存在显著影响，这对于比对“太湖盆地”内部各个村落的经济结构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形成了当地的地区间分工。同时长江三角洲的灌溉条件极佳，与华北平原几乎无法依靠河流、只有少数地区可以依靠水井形成鲜明对比。又一个令人感到惊讶的情况是，该地区水利工程状况的黄金时期竟然是千余年前的吴越国时期，此后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政府仅仅占有这部分土地而实施了更为有效的水利工程建设。国家财政机器能力不足，士绅阶层为自己的利益对整体的水利格局有所破坏，村庄内部也没能形成足够强力的水利工程建设和维护的治理机制，才造就了这样的局面。

第三章在简单描述了几种作物的种植后，分华北和长三角两方面考察商品化对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活动造成的影响。从华北来看，甘薯等高产粮食作物和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增加了家庭对辅助劳动力（妇女与儿童）的使用。长江三角洲也有类似的现象，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都是人口压力驱动的劳动集约化；但理所当然地，由于水土的不同，涉及的作物不一样。长三角地区增加的劳动力投入主要是用于越冬的小麦或大麦种植，以及棉花种植、桑蚕养殖。本章最后的比较当中，又指出了不能将两地区差别仅看作旱作农业与水田农业的差别，二者在家庭劳动力的利用程度上是有差别的。

第四章提到长江三角洲的发展过程中，近代出现了经营式农场衰落的情况。20世纪的江苏省统计资料纳入了地理上属于华北平原区的苏北地区；去除苏北地区后，几乎找不到经营式农场的迹象，经营规模至多停留在富农的层次上。同样经历商品化进程，经营式农业在华北能够取得发展，却商品化程度更高的长三角地区无法存活，其中原因实在耐人寻味。可以说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高度商品化的长三角地区能够为雇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家庭辅助劳动力能够承担多种较轻快的农业劳动，这使得男性劳动力需求相对更大，工资更高；华北地区劳动家庭化程度更低，只是在男性劳动力之间发生竞争。同时，应当意识到的一点是，商品化能够带来的，只是农业经营的高收益；这种高收益究竟如何通过地租在实际经营者和地主之间分配，对于经营式农业的发展情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长三角地区形成的高地租也阻碍了普通经营者扩大规模。

第五章考虑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本质。桑蚕业的发展和缫丝环节被纳入家庭生产、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的扩大、以及豆饼肥料的使用，都只是通过增加劳动力的利用率提升劳动力的年收入；但这是以降低平均劳动日收入为代价的。此即所谓过密化的发展。